

人的一生有很多抉择,不同的抉择,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,也书写着不一样的历史。五寨三岔堡人赵宝成、李在唐,城内西街人李希龙,于革命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,选择走上了一条为生民立命、为民族开新天的荆棘长路。他们以赴汤蹈火之勇奋进,以殚精竭虑之诚担当,以至死不渝之贞坚守,义无反顾,前仆后继,终以青春热血铸就信仰丰碑。斯人可敬,堪称为革命早期的“五寨三杰”。让我们一同致敬家乡的革命先驱,感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,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,激励后人继续前行。

外出求学:探寻救国救民真理

20世纪初期的中华大地,随着帝制的覆灭,历史掀开了动荡的一页。外国资本凭借不平等条约,贪婪地攫取着中国丰饶的矿产资源。经济命脉受制于人,民族尊严荡然无存。亿万黎民百姓,在这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,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苦难深渊。

而遥远偏僻、贫瘠饥寒的晋西北,此刻仍在暗夜中昏睡,信息闭塞,交通断绝,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。这里亟待一种全新的、觉醒的力量,如同穿透厚重云层的惊雷闪电,去照亮那深不见底的黑暗,去点燃蕴藏在沉默大地深处的、改变命运的火种。

五四运动的惊雷,终于震动了晋西北五寨这片几乎被遗忘的角落。新文化、新思想借助报刊、社团和人际网络,顽强地穿透了地理与信息的双重壁垒,点燃了当地青年心中的火种。以赵宝成、李希龙、李在唐等为代表的几十位五寨青年,纷纷走出闭塞的家乡,走向北京、上海、太原、武汉等思想高地,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和激烈的思潮碰撞中,找到一条照亮故土黑暗、解民于倒悬的道路。

历史的巧合在于,他们负笈远行的年代,恰恰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—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。所以他们走出五寨的每一步,都踏在了时代变革的脉搏上。在太原、北京、上海,他们不仅接触到了科学、民主的启蒙思想,更直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、工人运动风起云涌、建党伟业方兴未艾的洪流之中。他们的抉择之路竟是如此清晰可见。

赵宝成:京华求索,真理引路

赵宝成,原名赵成璧,字元和,生于1902年。其父赵世禄,清末秀才,同盟会员,在太原任职,赵宝成随父在太原完成了良好的初级教育。1923年春,在太原读完中学的赵宝成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踏上了北上的列车,考入北平民国大学。当时的北京,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,更是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。在这里,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,更重要的是,他多次亲耳聆听了李大钊、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的演讲。那些关于社会不公根源的深刻剖析、关于劳工神圣的呐喊、关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、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绘,如同惊雷般震撼着他的心灵。他如获至宝地阅读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刊物以及马列主义著作。在李大钊等人思想的感召下,在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中,他原有的救国救民热情迅速升华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。1924年,这个来自晋

“五寨三杰”的初心与抉择


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

西北山区的青年,在革命先驱黄日葵的介绍下,郑重地加入了刚刚成立三年、尚在秘密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转折点,也使他成为了五寨县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,也成为当时山西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。他的入党,标志着共产主义的星火,开始在五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播撒。

李希龙:沪上熔炉,淬火成钢

李希龙,又名李心宰,人称“李家三少爷”,与赵宝成同龄,他的觉醒之路始于太原。1921年,李希龙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。这一年,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。尽管信息传播相对滞后,但五四精神的延续和关于这个崭新政党的零星消息,足以让身处省城的进步青年感受到时代的风向。他如饥似渴地接受着新思潮的洗礼,思想日趋激进。1925年,为了追求更前沿的思想,踏上更广阔的革命舞台,他毅然选择并考入上海大学。上海大学,这所实际上由共产党人主导的“红色学府”,聚集了陈独秀、瞿秋白、邓中夏、蔡和森、恽代英等一大批中共早期领袖和理论家。在这里,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抽象的理论,而是与澎湃的工人运动、尖锐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的现实课题。李希龙一踏入“上大”,便沉浸在这浓厚的革命氛围中。在师长们的直接教诲下,在同窗革命激情的感染下,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迅速确立并变得无比坚定。到校后不久,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即将到来——1925年5月30日,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。李希龙没有丝毫犹豫,立刻与上海大学的同学们一起,勇敢地走上街头,投入到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洪流中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,经历了血与火的初步洗礼。上海这座大都市,成为了他革命生涯的熔炉和起点。

李在唐:同乡引路,薪火相传

生于1905年的李在唐(字怡琴,又名人龙),作为三人中年纪最小者,他的革命启蒙更多得益于同乡先行者

的指引。1924年,他追随赵宝成、李希龙的足迹,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。此时的太原,在中共早期党员高君宇等人的影响下,革命思想也在悄然传播。李在唐求学期间,深受进步思想影响,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满关切。他与同乡赵宝成、李希龙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同乡不仅向李在唐传递着北京、上海的革命见闻和党的理论,更以自身的行动为他树立了榜样。在先驱者革命实践的感召下,在革命理论的熏陶下,李在唐的革命信念日益成熟。1925年底,经由已在上海入党并具有影响力的李希龙介绍,李在唐在太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的入党,也是“五寨三杰”革命小团体的形成,也生动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“一人觉醒,带动一片;一地星火,渐成燎原”的组织发展模式。家乡的感情,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下,升华为牢不可破的革命情谊。

归乡播火:星火初燃五寨城

整整一百年前的那个酷暑7月,对于处在晋西北的五寨小城而言,一个觉醒的契机正悄然降临。从太原、北京等革命思潮奔涌之地归来的学子——赵宝成、李希龙、李在唐,以及并肩同行的李希皋、王明秀、郝良琴等人,在革命熔炉中淬炼后,首次相约回到了桑梓故园。他们胸膛里激荡的,不仅是乡情,更是一腔革命热血。

7月3日,是农历五月十三,关公磨刀日,也恰是五寨城一年一度最喧闹的庙会日。这座边长仅四华里的小小县城,被四乡八里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。空气里弥漫着汗味、白皮饼子的清香、新打铁器的生腥味,还可听到铜板与纸币摩擦的窸窣声。农人们攥紧手中微薄的积蓄,在摊铺间穿梭,换取油盐酱醋、镰犁犁耙,再来碗撒满茱萸的粉汤,这是他们一年辛劳中难得的喘息与放松的时候。大东街、西街、关帝庙、娘娘庙、文庙,尤其是城中心十字街,人声鼎沸,烟火气十足。

就在这片市井喧嚣中,几位身着整洁学生装的青年突然到来。他们目光如炬,手中紧握着一叠叠散发着新鲜油墨气息的传单。无需召唤,那崭新的纸张、青年们激越的姿态,如磁石

般吸引了路人好奇与渴望的目光。人群先是迟疑,随即蜂拥而上,争相索要这“稀罕物”——那薄薄的纸页上,是山外世界的信息。

只见为首的几名青年,敏捷地跃上街边稍高的石阶或货箱。刹那间,庙会上的嘈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,千百道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不再是文弱的书生,而是化身时代的号角,激昂的声音穿透市集。他们向群众讲解国内外形势和上海五卅惨案真相,揭露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,号召受压迫人民大众团结起来,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,推翻中国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统治,响亮地喊出了“打倒帝国主义,打倒封建主义”的口号。

这石破天惊的口号,第一次如此清晰地、如此有组织地在晋西北的黄土地上炸响!它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阴云,在无数赶会农人迷茫的心头,射进第一缕觉醒的强光。这不再是简单的庙会,而是五寨历史上第一场公开的、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战。沉寂的晋西北,从此埋下了革命的第一颗火种。

革命的热情岂能止于街头的呐喊,行动紧随其后。李希龙的目光,越过自家院墙,落在了隔壁文庙那座庄严的魁星阁上。阁楼轩窗静默,在夕阳下勾勒出清晰的剪影。“就是它了!”一个绝妙的想法闪现。这供奉文运星宿的古老建筑,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——成为点亮暗夜的第一盏明灯。

很快,“夜光学社”的旗帜便悄然悬挂于魁星阁之上。夜幕降临,城里沉寂时刻,唯有这阁楼之窗,透出温暖而坚定的光亮,彻夜不息。他们不再是散兵游勇,而是有组织、有阵地的革命先锋。油印机转动,散发着墨香的《夜光》小报在县教育会秘书刘俊德的协助下,通过石印机源源印出文字,如涓涓细流,悄然浸润着干涸的土地。

阁楼之内,是另一个沸腾的世界。三十多位渴求光明的五寨青年聚集于此。昏黄的油灯下,《新青年》上崭新的思想如春风送暖,《北方红旗》传递着党的声音,《共产主义ABC》解开了神秘的理论面纱,《列宁传》展现着革命领袖的风采,《国家与革命》则如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……翻动书页的沙沙声,低声而热烈的讨论声,取代了旧日的沉寂。读书报告会、形势讲演会,一次次思想的碰撞,如同燧石相击,迸发出耀眼的火花。

这方寸之间的魁星阁,在五寨的革命叙事中,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初始角色。它于闭塞的黄土沟壑深处,似第一簇思想觉醒的火苗,对彼时困顿于蒙昧与迷惘中的本地青年而言,它并非虚无缥缈的“灯塔”。魁星阁那彻夜不熄的灯光,微弱却顽强,穿透百年的时光,依然昭示着信仰与理想的力量。

血色元旦:太原新华舞台响起爆炸声

1926年冬,赵宝成与李在唐分别从北平民国大学和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。李希龙则继续在上海大学求学,并将新婚妻子侯自修(五寨川口村人)接到上海,两人一边学习,一边投身党的秘密工作,侯自修亦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(下转第五版)